



中國國際扶貧中心
International Poverty Reduction Center in China



国际减贫理论与前沿问题



2011

李春光 主编

 中国农业出版社



中國國際扶貧中心
International Poverty Reduction Center in China



**Theory and Frontier Issues in International
Poverty Reduction**

国际减贫理论与前沿问题

2011

主 编：李春光

副主编：何晓军 李小云 刘民权

中 国 农 业 出 版 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国际减贫理论与前沿问题. 2011 / 李春光主编. —
北京: 中国农业出版社, 2011. 9
ISBN 978-7-109-16054-5

I. ①国… II. ①李… III. ①贫困问题-世界-文集
IV. ①F113. 9-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1) 第 184137 号

中国农业出版社出版
(北京市朝阳区农展馆北路 2 号)
(邮政编码 100125)
责任编辑 赵 刚

北京中科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2011 年 9 月第 1 版 2011 年 9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本: 720mm×960mm 1/16 印张: 20.5

字数: 368 千字 印数: 1~2 000 册

定价: 35.00 元

(凡本版图书出现印刷、装订错误, 请向出版社发行部调换)

主 编：李春光

副 主 编：何晓军 李小云 刘民权

编 委（按姓名笔画排列）：

于 敏 王小林 王素霞 刘民权

李小云 李春光 张德亮 何晓军

赵丽霞 唐丽霞

编 者 的 话

2009年中国国际扶贫中心在联合国开发计划署（UNDP）“增强中国国际扶贫中心开展南南合作能力（CPR/09/2109）”项目下启动了《国际减贫动态》编纂项目。2010年，在国家财政预算项目下继续开展该项目。《国际减贫动态》旨在反映国际减贫与发展理论和前沿问题，介绍减贫与发展的前沿研究、全球热点、典型案例。

《国际减贫动态》发行以来，受到减贫与发展领域的政府部门、研究机构和相关人士的好评。为了进一步传播《国际减贫动态》，扩大社会影响，与更多的读者分享这些成果，中国国际扶贫中心于2010年从《国际减贫动态》中选择15篇文章，编辑出版了《国际减贫理论与前沿问题·2010》。该书出版后，深受社会各界特别是各省（市、区）扶贫办干部的欢迎。为此，现从2010—2012年的《国际减贫动态》中选择了19篇文章，并从中国国际扶贫中心《研究报告》中选择了2篇文章，编辑出版《国际减贫理论与前沿问题·2011》。

《国际减贫理论与前沿问题·2011》分为四个专题：减贫理论，前沿问题，减贫实践和国别案例。这些专题涵盖了当前国际减贫领域关注的重要理论和实践问题。编委会感谢本书原文作者及所在机构对于授权编译相关文章给予的大力支持和帮助。



2011年9月8日

目 录

第一部分 减贫理论	1
资产与长期贫困.....	3
贫困脆弱性：概念框架和测量方法	18
自然资源与长期贫困	32
中国多维贫困测量：估计和政策含义.....	47
中国多维贫困指数（MPI）概览	59
第二部分 前沿问题	65
迈向绿色经济：通向可持续发展和消除贫困的各种途径	67
资源管理及贸易对脆弱地区和脆弱人群的影响	
——来自 6 个案例研究的经验	79
水资源与发展：世界银行评估报告（一）	101
水资源与发展：世界银行评估报告（二）	120
应对气候变化问题的多中心路径	140
减少贫困的气候交易——世界银行的作用	159
第三部分 减贫实践	173
饥饿人口减半：通过“独特业务”	
实现千年发展目标中的首个目标	175
全球社会保障体系的覆盖范围.....	189
消除女孩长期贫困：以公正的社会制度促进发展变化	200
社会企业——向建立新经济社会秩序迈进一步	214

第四部分 国别案例	225
减少跨代贫困：纽约城市机遇有条件现金转移项目的早期发现	227
菲律宾贫困原因、限制条件及面临机遇	245
巴西、中国和印度的减贫比较.....	255
孟加拉国的减贫策略及发展历程	272
坦桑尼亚农业增长、贫困和营养状况研究	286
道路建设对减贫的影响——以喀麦隆为例	305

第一部分

Journal Pre-proof

[illegible]

资产与长期贫困

Andrew McKay*

一、引言

长期贫困研究中心（CPRC）一向采用动态的方法进行贫困研究，对福利产出的变化尤其予以特别关注。在这一研究框架中，资产的作用的核心所在。个人拥有的（或能够获得的）资产至少在两个方面发挥着作用：一是极大地贡献于降低脆弱性，而脆弱性是长期贫困和短期贫困的主要维度之一。大量证据表明，资产能够提供应对生计冲击（shock）的保障，减轻不安全性，避免会招致风险的行为，降低对破坏性应对策略（这种策略通常会导致降低资产水平——如迫使儿童辍学等）的依赖。当然，许多家庭，尤其是陷入长期贫困的家庭，可能无法获得足够的资产，他们应对脆弱性的能力也相应地受到限制。资产的第二个重要作用体现在提高家庭收入以及其他产出方面。拥有更多资产的家庭，通常更容易提高收入水平并参与经济增长（如获得更好的信贷渠道），也更易于维持和改善其现有的生计水平。

资产积累是摆脱贫困和改善生计的重要手段。拥有更多资产也有助于获得和提高社会地位，并从公共政策干预中获取更多利益。而资产损失（例如遭受健康冲击）则会将家庭拖入贫困。缺乏资产的家庭陷入贫困陷阱的风险更高（Carter 和 Barrett, 2006），至少在社会环境改善时会被甩在后面。这种不平等的动态变化是重要的生计风险之一，可以从资产的角度加以理解。

如生计框架所示，重要的资产为数众多。同时，个人和家庭获得资产的程度也影响到他们对这些资产的使用。如果一个人无法获得一个技术岗位或由于歧视而导致妇女的薪资较低，再高的人力资本都无济于事。缺乏有效利用资产的能力（即资产的“低回报”）可能会导致长期贫困；而获得充分的资产回报的能力则是（在长期内）摆脱贫困的重要因素之一。可见，个人使用资产的能力是十分重要的影响因素。此外，一些本就缺衣少穿的家庭变卖资产的需求，也是长期贫困的成因之一。分析为什么一些家庭需要做出这样的选择，而另一

* 作者系 University of Sussex。

些则不然，同样有助于理解长期贫困。

各种资产常被用做衡量贫困的指标，而如何综合概括各种不同的资产仍然是个挑战。相对于收入和消费而言，个人或家庭所拥有的资产波动较小，可以作为衡量长期福利的指标。因此，缺乏主要资产就等同于长期贫困。

综上所述，获得资产的类型（无论是否拥有所有权）以及使用资产的方式，都是分析脆弱性、贫困动态和长期贫困的关键，也是这些问题的政治含义所在。分析一些个人（或家庭）拥有和积累资产的过程，而另一些个人（或家庭）为何无法做到；以及一些个人（或家庭）能够比其他个人（或家庭）更有效地使用资产的原因，都有重要的意义。

针对这些问题的讨论大多集中在家庭（微观）层次，而中观和宏观层次的类似问题也正在进入人们的视野。例如，如果一个个人或家庭位于相对落后的地区（而其所在国的其他地区在持续增长），这本身就是导致长期贫困的一个重要因素；再如，一些特定的村庄可能由于特定的劣势，而看似没有脱贫的指望。身处一个经济持续倒退（或至少没有增长）的国家，身为穷人很可能意味着陷入长期贫困。可见，中观和宏观环境十分重要，在讨论资产、资产回报及脆弱性时应加以考虑。

本文首先将脆弱性定义为影响长期贫困和短期贫困的核心要素，并探讨资产（及资产缺失）与脆弱性的关系；随后分析了贫困过渡过程中资产持有的变化情况（第三部分），并延伸到对以资产为基础的贫困陷阱（第四部分）和歧视的可能影响（第五部分）的讨论；最后加以总结，并提出未来可能的研究方向（第六部分）。

二、资产和脆弱性

在实践中，贫困人口的资产组合往往更加复杂。因此，减贫政策应该对贫困人口所拥有的资产与其所缺少的资产给予同等的关注（Moser, 1998），应该帮助他们积累并有效地管理资产。资产是贫困人口抵御生计冲击的关键所在。而同样地，资产缺乏会加剧脆弱性。

就资产对脆弱性的重要影响所进行的诸多研究而言，主要集中在农村地区（Swift, 1989；Sen, 1991；Maxwell 和 Smith, 1992）。Barrett（1999）也强调了资产在粮食安全中的作用。拥有现金储蓄意味着能够购买食物；拥有土地和充足的人力就能够进行耕作；而拥有支持性的社会网络或政府关系则能够获得产品（甚至是免费获得）。许多案例表明，资产能够缓冲特质性或同质性的风险，并成为社会地位的决定因素（Barrett 等，2006a）。然而仅有资产仍然

不够,制度和技术的同等重要(Barrett, 1999):如进入市场和获得生产技术,以及政府或私人企业的食物分配等。

应对生计冲击的方式很多(Chambers, 2003; Dercon, 2000)。通常首先启动事后反应机制以试图稳定消费水平,如生计活动多样化、调整消费结构以及支取存款等。出售资产也是一种可行之道,但应避免危及家庭未来的生计安全。每个家庭采取的具体措施取决于其现有的资产及市场渠道。多样的资产组合和市场渠道能够应对气候和市场变化的影响,避免物质资产脆弱性的出现。如果以市场为基础的应对机制不奏效,下一步就是求助于“道义经济”——即由家人和朋友构成的支持网络(Lourenço-Lindell, 2002; Woolcock, 2005)。然而“道义经济”的效率依赖于社会资本的充分发育,以及非同质性的生计冲击——即家人和朋友没有同时遭遇危机。而正式援助项目是在危机中获得支持的第三个渠道(Devereux, 2002)。

在城市地区,相关的环境和资产呈现出显著的差异(Moser, 1998; Mitlin, 2003; Nkurunziza 和 Rakodi, 2005)。与农村地区相比,这里的设施更加完善,商业化程度也更高,当然环境问题也更为突出,如住房简陋、水资源和卫生设施缺乏、污染等等。而道义经济则不及农村的发展程度。对城市居民而言,重要的资产类型通常包括劳动力和人力资本;生产性资产中,住房可能很关键;此外还有无形的资产,如家庭关系和社会资本等(Moser, 1998)。包括贫困者在内的大多数城市家庭都能或多或少地从这些资产中获益,从而构成应对冲击的基础。他们通常对家庭的劳动力供应进行很大程度的调整,如加强孩子和妇女的劳动强度(可能会引发负面的长期后果,如家庭关系受损等)或家庭成员外出务工等(也会危及家庭关系)。家庭经济活动可能会促使住房也成为一种能够创收的资产。同时调整更加灵活的家庭消费以应对冲击(如增加或减少家庭成员等)。社会资本是应对冲击的关键,如采取更多以社区为基础的活动,加强对社会网络的依赖等(González de la Rocha, 2006; 2007; Lourenço-Lindell; 2002)。

在应对冲击时,家庭通常会寻求对资产的保护,这可能导致对消费的调整。Devereux (1993) 将调整消费看做是应对冲击的策略(Corbett, 1988);而 Moser (1998) 则就不会危及家庭净资产持有的消费类型的调整加以关注。从经验证据看, Fafchamps 等(1998)发现,在 20 世纪 80 年代布基纳法索的极端干旱气候中,出售牲畜只能弥补一小部分的收入损失;也没有证据表明当地家庭的粮食储存、非农工作或现金转移能够弥补这些收入损失。因此,拥有牲畜的好处在于干旱结束之后较高的回报率,或者是由于在布基纳法索牲畜等同于固定资产,而在生计冲击下的调整仍然来自于消费水平的调整。来自乌干

达的证据也表明，家庭会通过调整消费来回应生计冲击。

值得注意的是，虽然贫困人口的资产十分有限，他们对自然资源（包括公共资源）的依赖程度却明显高于非贫困人口（Arun, 2008）。这种依赖可能导致贫困人口面临更严峻的生计威胁：如无法得到充分的法律保护、引发冲突的可能性加剧或受到歧视等。此外，在（并不鲜见的）缺乏话语权的情况下，他们也没有能力宣称资产获取权、以法律手段保护自己或对抗歧视。贫困人口的资产贫困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他们与社会的隔离（Arun, 2008）。不当的资产管理实践（如过度开采公共资源、缩短休耕期等）会进一步加剧贫困人口的脆弱性。在许多国家，妇女缺乏对土地的法定权利，从而限制了她们对土地资产进行有效利用以降低生计脆弱性的可能。因此，虽然贫困人口的确拥有资产（这一构建政策干预的重要资源），但其拥有的资产极为有限，（由制度、治理和歧视等问题导致）对资产的有效利用又困难重重，也就无法通过资产利用来降低脆弱性。

社会资本十分重要。上文提到，社会资本是贫困人口的一种生计应对机制，有限的资产和管理资产的困难使社会资本的重要性进一步凸显。虽然社会资本对贫困人口的意义更大（即便贫困人口的社会资本存量更低），然而政治资本也很关键（Arun, 2008）。社会资本的发展意味着社区组织（CBO）的有效发展。Moser（1998）在城市寮屋（squatter）区的研究表明，水平层次上的社区组织正在蓬勃发展。然而社会资本的作用也是有限的。Moser（1998）在城市地区的研究发现，如果自身的资产已然耗尽，人们就无力为社区提供支持。可见，社会资本固然重要，但脱离住房、朋友和教育的支持时，其作用就无法发挥。因此，对贫困人口来说，对社会资本的投资不能取代对其他类型资产的投资（如人力资本、土地和住房的产权、寮屋信贷等），后者在降低贫困人口面临的脆弱性方面也至关重要。

各种类型的资产在降低家庭面临的脆弱性中都不可或缺。但是许多家庭能够拥有的资产有限，也难以有效地对其加以管理，最终导致脆弱性加剧，贫困根深蒂固。

三、资产积累、资产损失和贫困过渡

大量经验证据，特别是对比数据，显示资产损失（通常是突发现象，例如严重的疾病）或资产积累（通常是个渐进的过程）与陷入贫困或脱离贫困密切相关，甚至正是陷入贫困或脱离贫困的原因所在。同样地，诸多文献对个人或家庭利用资产来影响其生计策略和贫困程度也进行了研究。本节援引一些近期

的实证研究，对这些问题进行简要的评述。

（一）资产冲击和陷入贫困

如上文所述，大量研究表明，关键资产的缺失是陷入贫困的主要原因之一，而贫困通常会持续较长时间。许多资产损失是由健康冲击导致的。健康是人力资本的重要维度之一（也是衡量福利的重要指标），许多实证研究能够为此提供证据（Harpham 和 Grant，2002）。在乌干达的农村地区，Krishna 等（2006）发现疾病带来的影响是陷入贫困的主要因素。疾病的影响是多方面的，包括对病人健康的直接危害、高昂的医疗费用或劳动力的死亡等。而土地带来的影响如土地划分（与继承）或土壤肥力下降等也是致贫的显著因素。

Ahmed（2005）指出，在孟加拉，最贫困的人口无法负担过于高昂的医疗成本，导致发病率上升及被迫使用破坏性应对措施（如出售资产、寻求高利贷等），促使贫困进一步加剧。同样地，Krishna（2004）发现，在印度拉贾斯坦邦，健康冲击会带来贫困和高额负债，高昂的利率是贫困家庭难以脱贫的桎梏。这些案例都表明信贷市场失效对贫困人口脱贫进程的严重制约。

在加纳东部，较小规模的家庭受健康冲击的影响更加严峻，贫困和较小的家庭规模之间的恶性循环业已形成（Whitehead，2006）。这些家庭在疾病和死亡的冲击面前，显得更加无能为力。这一现象与主流的研究结果相悖——通常认为家庭规模越大，其贫困程度越深。当然主流观点在其他一些研究发现中也有所体现（如 Howe 和 McKay 在 2007 年关于卢旺达长期贫困人口的研究）。

艾滋病是一种严重的健康冲击，会通过各种方式影响人力资本的构建：如教师和培训师的死亡；教育投资的预期回报下降；父母将教育投资分散在所有孩子身上，从而降低了每个孩子充分接受教育以从事高回报率工作的可能性；医疗开支增加；储蓄下降；资产流失和消费水平降低等（Hamoudi 和 Bird-sall，2001）。

影响教育过程中人力资本构建的其他负面冲击还有很多，仅仅以传统的教育指标（如入学率）加以衡量远远不够。在秘鲁，Escobal 等（2005）发现，削减教育经费、缩短学校教育时间，或从高质量的私人学校到较差的公立学校的转学等冲击所带来的影响，不一定会反映在入学率上。

Sen（2004）在孟加拉的研究发现，各种各样的冲击都会导致贫困——如生命周期的改变（即增加老年和幼年人口的比例）、健康冲击、自然灾害等。Barrett 等人（2006b）指出，在肯尼亚和马达加斯加，资产冲击的影响有所缓减，与健康、土地和劳动力相关的生计冲击更是如此。乌干达的城市精英认为，酗酒和懒惰是贫困的主要成因。然而 Krishna 等（2006）的研究却否定了

这一偏见（当然也有少数特例存在）。

显然，资产损失是陷入贫困的主要原因。其中大量证据指向健康冲击。一个家庭是否具备不采取破坏性的应对策略就能够应对这类危机的能力，正是其是否能够从冲击中恢复的决定性因素。Hoddinott（2006）在乌干达的研究发现，暴雨灾害导致当地儿童的身体质量指数下降，然而家庭条件相对较好的孩子能够在冲击过后迅速恢复到正常水平，来自贫困家庭的孩子则不然。是哪些因素影响了这些家庭无需牺牲长远的生计目标就能应对资产冲击或其他冲击的能力，以及如何提高这些家庭的这种能力，仍然是个未尽的研究主题。

（二）资产积累和脱离贫困

积累主要资产的过程及拥有充分的资产存量，是个人或家庭能否脱离贫困的重要因素。然而许多家庭无法积累足够的资产。这正是理解长期贫困成因的关键。

众所周知，家庭的收入水平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其资产持有。Ellis 和 Freeman（2004）认为，资产积累是一个以牲畜数量和获得非农就业的能力为重要前提、由一系列交易活动组成的渐进过程。能够在多大程度上进行资产交易是影响当地家庭福利增加的重要因素，而许多家庭却由于各种原因恰恰不具备这种能力。在这种情况下，牲畜在生计成功（如储蓄、收入稳定等）中发挥着多重作用——它们能够成为改善福利水平的良好开端，而缺少它们则会导致贫困。此外，Ellis 和 Freeman 还发现，收入增加也会极大地贡献于土地生产率的提高。

在墨西哥，即便获得一小块土地，也能极大地提高福利水平（Finan 等，2005）。然而土地的价值仍然取决于是否能够获得其他配套资产，如拥有初级教育和道路等等。在津巴布韦的农村地区，这些配套资产的重要性也同样凸显（Chimhowu，2002）。获得更多的土地对于促进脱贫而言非常重要，然而由于其他要素的缺失，土地并不能为大多数家庭带来足够的收入。这些缺失的要素包括提供社会服务和基础设施的公共政策干预等。通过对南部非洲地区的研究，Chimhowu（2006）认为（由于各种原因导致）土地改革对减贫的贡献十分有限，而 Rigg（2006）则声称土地的再分配不可能带来财富的再分配，其原因之一是人们越来越多地从事非农劳动以寻求脱离贫困。

如上文所述，针对资产积累和脱离贫困的研究大多针对农业生产。当然也有一些研究注意到了影响人力资本的因素。人力资本不仅仅是福利产出之一，也是其他产出的先决条件。Attanasio 和 Szekely（1999）分析了在拉丁美洲缺乏教育和贫困之间的密切联系。在哥斯达黎加和秘鲁，贫困人口的人力资本不

足，导致在劳动力市场中的回报十分有限。在巴西，风险和不确定性导致贫困人口不愿投资于人力资本，转而更加青睐容易获得回报的资产，然而这些资产往往缺乏长期的生产力。

如果信贷市场发育不完善限制了对人力资本构建进行投资的能力，移民及相应的劳务汇款就成为提高学校入学率的主要因素（Mansuri，2006）。在许多拉丁美洲国家，有条件的现金转移极大地提高了初中入学率，显著地减少了童工数量（MCDSS/GTZ，2006；Haarman 等，2008；Samson 等，2006；Rawlings 和 Rubio，2005）。

在许多情况下，带薪就业是脱贫的重要推动力（Whitehead，2006；Krishna 等，2006）。人力资本的重要性不言而喻。

大量证据已经证明了资产积累在脱离贫困中的重要性。然而目前的研究主要针对农村地区（特别是在农业或脱离农业方面）的人力资本。显然，许多个人或家庭仍然没有能力积累主要资产。理解其原因及可能的政策应对措施，是个重要的研究议题。市场运行逻辑及现有公共政策的性质，可能是理解这一问题的关键。

（三）资产回报和贫困过渡

如上文所述，影响贫困状态的因素不仅包括个人或家庭获得资产的程度，也包括他们使用这些资产的方式。如果不能加以有效利用，资产的价值就会大打折扣。

Rigg（2006）认为，土地已经不再是农村贫困人口脱离贫困的先决条件。他指出，农村生计已经渐渐地脱离农业生产；而众所周知，非农活动的重要性日益增加，成为许多农村家庭走出贫困的重要途径。他的分析否定了资源再分配能够重振农业生产的观点，对在农村地区和农业部门内部解决农村贫困问题的路径提出了挑战（即“自耕农谬论”）。

在传统的观点中，贫困被归因于缺乏与市场的整合或国家制度的缺位——偏远的农村地区更是如此——而逾越这些障碍就会增加贸易机会，提高收入。Rigg（2006）却认为，市场整合可能会带来“新的贫困”，并质疑农村地区的贫困人口能够在多大程度上受益于商品化程度的增加和市场的整合。无论这种观点正确与否，我们至少能够肯定：农业部门之外存在着许多绝佳的减贫机会。如上文所述，许多人认为农业部门之外的带薪工作是最好的选择。

在乌干达的农村地区，生产力提高和经济作物的种植与脱贫的相关性十分显著（Krishna 等，2006）。然而通过此途径实现脱贫的农户为数甚少。与脱贫相关的其他因素包括个体生意的成功（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的回报）、获得

带薪工作等。事实上，带薪工作已经在许多国家都成为脱离贫困的重要路径。

在加纳东北部，相对于劳动力和资金而言，土地并非最重要的限制因素（Whitehead, 2006）。对家庭劳动力和家庭成员的管理，是家庭安全的核心所在——能够保证家庭劳动力的充分供应。因此，在家庭规模和财富之间存在良性循环。而缺乏劳动力又没有足够的财富积累就会陷入贫困，导致临时性出卖劳动力（从而破坏农业生产）甚至移民，使贫困进一步加剧。获得稳定就业能够促进积累，从而在城乡之间游刃有余。然而，农村就业机会的缺乏仍然是巨大的阻碍因素。

那么，阻碍非农部门就业的因素仅仅是资产水平（如人力资本）呢，还是更多（如歧视或社会关系）？Ellis 和 Freeman（2004）强调了降低对农业生产的依赖对脱贫的重要性。而 Sen 也指出，在孟加拉，脱离贫困和从事多元化生计策略之间的显著相关。例如，在首都达卡，人力车夫的生计总是难以为继（Begum 和 Sen, 2004）。对他们而言，这种单一的生计就成为贫困陷阱，其子女无法接受学校教育，又导致了贫困的代际传递。

（四）其他相关因素

在资产所有权方面，在家庭内部“谁控制能够获得的资产”是个关键性问题。Hoddinott（2006）发现，在津巴布韦的家庭内部存在着消费水平的明显差距。Doss（2005）也发现，在加纳，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拥有更多资产所有权的妇女，其健康和营养状况较好。Valdiva（2001）在印度尼西亚的研究同样指出，如果女性成员能够控制更多的资产，福利产出将会得到改善。

显然，不同的个人和家庭在其能够获得的资产上的回报率并不相同。这不仅反映了资产水平或特定的资产组合方式，也反映了资产获得的差异。两个拥有相似资产存量的个人或家庭，完全可能得到截然不同的回报——这一差异往往与歧视有关。然而，仍然缺少（来自劳动力市场之外的）经验研究就歧视对长期贫困的影响程度加以分析。

从根本上来说，仍有必要更好地理解个人和家庭就其拥有的资产获得不同回报的过程和原因。

四、资产与贫困动态的关系

针对贫困动态的传统研究往往从金融维度入手，以家庭调查数据为基础，将贫困划分为短期贫困和长期贫困（Hulme 和 McKay, 2007）。研究长期贫困曾使用过时间分析和组成分析两种路径（McKay 和 Lawson, 2003）。然而在